



在“四史”教育中汲取党性修养的智慧

■周敬青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营养剂”和“清醒剂”。“四史”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增强底气、骨气、正气，提升党性修养水平的根本依据和内生动力。开展“四史”教育为共产党人加强党性修养寻魂、提供信仰之源、力量之泉、修养之本、心学之根。党员干部要善于在“四史”教育中汲取党性修养的智慧，做到信仰如山、信念如铁、信心如磐。

坚定信念、永葆先进
撑起强大精神支柱

学习“四史”，有助于党员干部正确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信仰是人的高级精神活动，目的在于追求理想境界。马克思主义信仰建立在科学理论基础之上，立足于对现实世界运动变化的本质和规律

的认识，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追求。2014年法国学者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指出：资本主义下财富累计方式显然是违反道德的。因为伴随着全球化的深入，近三十年来工业国家的资本的报酬率远远超过经济增长率，极大伤害了民主政治诉求的公平和正义，这种趋势还会继续下去。这种观点，再次印证了马克思、恩格斯在一百多年前的预测，资本主义本质上是一个不公正的社会，注定要被新的社会所取代。最近，美国《时代》杂志主编内森·鲁滨逊撰文《多一点社会主义的时机已经成熟》，称新冠病毒在美国的大流行已经证明社会主义者是完全正确的，美国人应该希望自己的国家更加社会主义一点。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正是在这个精神支柱的支撑下，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战胜困难挫折，留下了可歌可泣的精神财富。红军长征被《时代》周刊评选为1000年发生的100件大事之一。苏东剧变社会主

义低潮之时，邓小平充满自信：“苏东剧变和苏联解体并不表明社会主义已无希望……只要始终不渝地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是不会夭折的，相反，它仍然充满了活力和希望。”

实事求是、与时俱进
筑牢思想基石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直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发展性、实践性。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经院化，也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宗教化、神化；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搞所谓的“口头政治”，也不能理论与实践脱离。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革命者要改造和提高自己，必须参加革命的实践，绝不能离开革命的实践；同时，也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主观努力，离不开自己在实践中的自我修养和学习。”邓小平也多次强调他“是实践派，是实事求是派”。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

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寻求中国革命的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辛，终于找到一条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推进改革开放，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党和人民在改革开放中铸就了敢想敢干、敢闯敢试的创新精神；解放思想、海纳百川的学习精神；勇往直前、永不懈怠的奋斗精神；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实干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奉献精神；迎难而上、敢于亮剑的担当精神；同心同德、共赴时艰的团结精神。这些改革开放精神，与当代社会发展相协调，成就了跨越时空、跨越国界、跨越文明，极富魅力、催人奋进的新时代精神标识。

百折不挠、勇于纠错
展现高超政治智慧

中国共产党人勇于承认错误

改正错误，善于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保持坦荡的政治品质，绝不遮遮掩掩、文过饰非。1956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谈到自己曾打四次败仗，两次就发生在被形容为“用兵如神”的四渡赤水。毛泽东实事求是，迅速修正自己的失误，采纳别人的正确意见指挥战争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人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同一切弱化先进性、损害纯洁性的问题作斗争，祛病疗伤，激浊扬清，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牢记宗旨、执政为民
坚守初心矢志不移

坚持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一贯倡导的群众

观。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变革决定了社会的最终发展，决定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变革的力量是由社会绝大多数人组成的社会大众，每个历史时期的普通民众，既是那个时期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又是推动历史前进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共产党人通过增强人民主体意识和领导干部的公仆意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警惕腐败既得利益集团产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人也好，一个政党也好，最难得的就是历经沧桑而初心不改、饱经风霜而本色依旧。”“忘记初心和使命，我们党就会变质、改变颜色，就会失去人民、失去未来。”我是谁？代表谁？为了谁？依靠谁？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路走来之本源之问、时代之问、初心之问、使命之问、方向之问。党性是共产党人立身、立业、立言、立德的基石，党性修养是共产党人终身修炼的“心学”。党性修养不会随着党员党龄的积累而自然提高，也不会随着职务的升迁而自然提高，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不断增强，在学习教育中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只有铭记自己的历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才能深刻地了解现在，正确地走向未来。

（作者为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

学者笔谈

浦东行政体制的自我改革与创新

■唐亚林

30年来，浦东新区行政体制不断自我改革与创新，主要归结于通过新区组织体系和发展空间的“物理变化”与新区综合配套改革和自贸区改革的“化学变化”的共同催化，型构了浦东新区自主改革创新的制度内生动力体系。

浦东开发开放30年来，在行政体制改革与创新方面，以服务政府、法治政府、效能政府为先导，围绕政府职能转变这一主线，聚焦开放与发展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政府内部纵向权力关系四大关系的重构，创造性地走出了一条以开放促发展、以行政体制创新促政府权力关系重构的地方政府治理现代化新路。

浦东新区行政体制创新经历三大阶段与改革重点。

第一个阶段从1990年至2004年，是浦东新区“开发区与地方一级政府体制”形成时期，其改革重点是建立“小而有效经济发展型政府模式”。这

段时期，浦东新区改革重点是组建以“大部门体制”和招商引资为核心的“小而有效经济发展型政府模式”。

第二个阶段从2005年至2012年，是浦东新区“开发区优化与综合制度创新”时期，其改革重点是建立“小而有效服务型政府模式”。这段时期，是浦东新区发展的物理空间急剧拓展时期，不仅表现为地理空间的拓展，而且表现为政府服务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机构、职能与人员也大为拓展。在此过程中，又通过综合制度创新的方式，将改革的重点放在构建“小而有效服务型政府模式”之上。

第三个阶段从2013年成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至今，是浦东新区“完整行政区域整体制度创新时期”，其改革重点是建立“有作为有效能型政府模式”。国务院分别于2015年4月、2017年3月、2019年7月印发《进一步深化上海自贸区改革开放方案》《全面深化上海自贸区改革开放方案》《上海自贸区临港新片区总体方案》，标志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建设从1.0版相继发展到2.0版、3.0版直至今天的4.0版。

从1.0版到4.0版，浦东新区进入了“完整行政区域整体制度创

新时期”，其改革重点在于通过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放管服一体化改革”，建立和完善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事中事后监管模式，并在此基础上，以亲清政商关系为着眼点，通过靠前服务、主动服务、热心服务，开始朝建立“有作为有效能型政府模式”之目标迈进。

30年来，浦东新区行政体制不断自我改革与创新的根本经验，主要归结于通过新区组织体系和发展空间的“物理变化”与新区综合配套改革和自贸区改革的“化学变化”的共同催化，型构了浦东新区自主改革创新的制度内生动力体系。

一是始终将建立科学化的政府理念作为指导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遵循。从浦东新区一开始组建起，上海市及浦东新区等各个层级就将建立透明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作为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理念遵循，并将其贯穿于行政体制改革与创新的全过程。近年来，在此基础上，又将回应政府、效能政府和协作政府作为创新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及政府内外和上下权力关系的重要理念支撑。

二是始终将建立系统化的政

府运作模式作为推动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有效载体。浦东新区重点推进了政府职能转变、经济运行方式转变、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三大转变进程，相继建构了以取消调整与下放增效为重点的精简、简政和放权新运作模式，以部门职能合并与事中事后监管强化为抓手的市场监管新运作模式，以监管和执法统一为目标的知识产权工作新运作模式，以便民利企和互联网为中心的政务服务新运作模式，以政府购买服务为动力的社会组织新运作模式五大政府运作模式。

三是始终将使命化的政府自我革命精神作为推动地方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动力。浦东新区不仅肩负着实现本区域现代化发展的重任，而且肩负着为上海、长三角乃至全国探索出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化大都市城区的新路。这就决定了包括浦东新区、上海市与国家有关部门在内的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要形成“上下同心求改革、左右联合促发展”的基础上，又将回应政府、效能政府和协作政府作为创新政府与市场关系、政府与社会关系以及政府内外和上下权力关系的重要理念支撑。

（作者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热点解读

新机新局“新”在何处

■贾华强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强调，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推动我国经济乘风破浪、行稳致远。这表明，我们需要在育新机、开新局中，推动我国经济继续走向可持续发展。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国际上诸多不确定性，中国经济遇到了一些难题。正是在这种时候，越要充满信心，越要善于把握机会。“育新机”“开新局”，这两个“新”，就是危中寻机、化危为机的方法论。

当今全球化经济世界的一个特征，就是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虽然美国当前的一系列举措使得国际市场国内化的发展前景扑朔迷离，但紧抓国际市场的那根弦，不能也不应放松。美国最赚钱的实体企业，正是通过把别国市场国内化的方式，得到了丰厚的利润，如苹果、波音、微软等大公司就是如此。应该说，我国经济发展有着育新机、开新局的天然条件。我国是一个经济大国，2019年末经济规模总量近100万亿元，仍保持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还有

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因此，只要我们加快完善安全发展体制机制，补齐相关短板，维护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积极引导全社会特别是各类市场主体增强信心，是可以依靠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和作用，来促进各类市场主体的自身发展和可持续发展，进而巩固我国经济稳中向好、长期向好的基本趋势的。

我国当前和今后的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但我国经济既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快速发展阶段，也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时期。这其中，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于国家发展的未来和可持续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因此，面向未来，“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我国发展”，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着力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建设“聪明城市”应当以人为本

■薛泽林

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出，从数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让城市更聪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广阔。

城市“智慧”按下快进键，以大数据、云计算驱动现代化城市治理是大势所趋。推进城市智能化管理，建设“聪明城市”，不仅要强调技术投入，更重要的是要在城市治理中更多地发挥技术的使能作用，让技术成为撬动城市能力提升的杠杆、发掘城市发展潜力的锄头、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推手。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建设聪明城市，首先要关注到新技术时代城市治理逻辑的两个层面变迁。一方面，城市治理的目标更加多元。已有城市治理理论往往要求发挥精英联盟的引领作用以及社会公众的参与作用，并在此过程中寻找社会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以此实现城市的安定团结以及城市善治。但进入新时代以后，城市治理的工作重心开始从“管得好”这一单一目标发展成

为“管得好并且生活好”这一复合目标，城市治理更加重视社会各主体的获得感和满意度。另一方面，城市治理的愿景更加丰富。随着人工智能和脑科学的飞速发展，社会中不少人开始对未来的政府治理图景产生迷思，再加上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和公共服务需求得到满足后对城市政府的期望不断提升，我国的城市治理也越来越需要新的想象力和未来图景，民心政治与价值治理成了城市治理新的价值取向，也即城市治理的实践，不但要满足人民群众的当下所需，也要为未来的美好生活描绘图景和期待。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建设“聪明城市”，还要回答好技术如何发挥使能作用这一核心命题。如在人工智能的具体应用中，我们可以将人工智能理解为“人工”+“智能”，有温度的管理和公共服务是建设“聪明城市”的价值取向。其中，人工智能在其中发挥着治理数据收集与处理的功能，目标是促进一线管理和服务人员与城市各主体实现精准高效的治理对接，提升人民群众对于治理

的感知度。即技术赋能治理体制机制，人工提供有温度的管理和公共服务。基于“人”而非“技术”的治理是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建设聪明城市的基本立足点。

建设“聪明城市”最终要回到“为人民服务”这一核心命题上。就是以技术手段为工具，通过不断提升社会公众的满意度和获得感，从而实现社会个体基于满意度和获得感，对政府具有高度信任，对治理体系具有高度期待，对现在和未来治理共同体充满期待的治理形态。具体而言，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速发展且其应用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扩展的宏观背景下，“聪明城市”的治理包含了城市硬件设施的查漏补缺，提升社会个体获得感；城市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提升社会个体满意度；城市治理价值重构，每一个阶段的落实都与社会公众的感知密不可分。这也就意味着在实践过程中，“聪明城市”内在地要求城市政府与社会各主体之间存在广泛且实际的连接，即城市政府的公共政策要能及时、准确、高效地反映社会

各主体的需求，以此实现社会各主体需求的满足、满意度的提升和民心的集聚。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习近平总书记不止一次地强调，要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在城市治理中，一定要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说到底，就是以人的需求为中心，为人民群众提供优质的公共服务，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为“人民的美好生活”不懈奋斗。因此，“聪明城市”能够满足人民群众需求，能够给城市管理者赋能增效，能够解决当下社会面临的焦点问题。目前，统筹抓好疫情防控常态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工作，建设“聪明城市”就是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建立防控境外疫情输入的全流程闭环，织密社区防控的细网，助力企业尽快复工复产，为城市疫情防控助力，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保驾护航。

（作者单位：上海社会科学院政治与公共管理研究所）

数字文旅点亮“一带一路”

■陈康令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旅游业创新，共建数字“一带一路”，能够在广阔的旅游市场和广大的文旅消费者之间搭建起高效、畅通、美好的数字桥梁，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和人民分享数字红利、捕获数字价值、缩小“数字鸿沟”。

一是继续完善数字经济生态。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数字一带一路”研究中心发布的《2019年数字“一带一路”年度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中国已与多国签署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合作谅解备忘录和双边电子商务合作谅解备忘录，上百家中国数字化企业（包括国企和民企）在跨境电子商务、通信基础设施、数字金融、智慧城市、产业互联网、智能终端、信息技术服务、泛娱乐等领先领域为各国广泛赋能，探索出“多中心+赋能+共享”的全球化新模式。方兴未艾的数字“一带一路”建设不但助力全球抗疫，也为沿线国家进行数字文旅合作夯实了基础。

二是常态推动数字经济对话。一年前，习近平总书记任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提出了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主张：“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需要文化文明力量。”一年后的今天，疫情无法阻碍人们的文化交流，数字科技帮助点亮了人类文明的灿

烂之光。上海多次在海外主办的“遇见中国”数字媒体艺术特展中，巧妙地将传统与现代、文艺与科技的融合置于文明交流体验之中，发挥了积极的示范作用。将来通过“云”博物馆、网上直播带货、虚拟景区参观等方式，还可以为“一带一路”国家的特色文创产品、经典非遗产品、景区周边产品等拓宽展销新渠道。

三是大力培养数字文旅人才。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是大势所趋。行业协会、文旅企业、培训机构、智库机构等应顺势努力提升行业从业者的数字化素养。2019年以来，教育部修订了《中等职业学校专业目录》和《普通高等学校高等职业教育（专科）专业目录》，并发布《关于在普通高校继续开展第二学士学位教育的通知》，为大量培养国家和社会急需的数字化和国际化复合型人才培养了道路。此外，还应更加重视和发挥好留学生和海外华侨华人在推进“一带一路”数字文旅合作中的语言优势和纽带作用。

希腊《现代外交》在线杂志最新文章认为，在数字时代和目前新冠疫情席卷整个世界的情况下，各国都急需帮助，而加速提升的软实力则为中国赢得人心。有理由相信，“一带一路”数字文旅合作也将创造出充满魅力的巨大价值。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